

1961年中央常委农村调查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

王 涛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部 北京 100091)

[摘 要] 三年“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其中农村是重灾区。面对困难形势,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群众寻求真理”,从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常委纷纷下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在同农民群众的密切接触中,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根据中央常委们的调查结果,中共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

[关键词] 1961年; 中央常委; 毛泽东;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人民公社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6-0085-06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时,曾开出了一份不断提前的赶超时间表,一开始提出15年赶超英国;接着是10年赶上英国,再奋斗10年赶上美国;而后是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最后定的目标是,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到3年的时间。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是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供给制、公共食堂被称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中共中央满怀信心的向人民宣布:“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

但是,这种前所未有的豪情很快被严峻的困难形势消减。由于集中精力保证钢铁产量,强撑“跃进”,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产品产量大幅度下降,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8227万头,比1957年的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的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2]185}。

面对如此困难的经济形势,应该如何处之呢?

一 毛泽东大力倡导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对农村情况的汇报中,逐渐形成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想法,成为这次会议的主旨。毛泽东希望从农业问题入手,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克服困难,扭转整个经济形势。

1月13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他说:“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的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3] 1116-1117}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首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也是他首次意识到三年“大跃进”的灾难源于冲动的革命热情和主观意志。因而,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必须从调查研究做起。

在接着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失而复得,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思想武器。毛泽东在会上说:“希望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3]1117}

会议结束后,党的工作有了很大转变。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党以农业问题为重点,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亲自指导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的三个调查组的工作,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周恩来也在一次会上说:“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做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4]625}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又多次讲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5]23,24}

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对调查研究也有明确的表态。

刘少奇在3月19日的会上说:“这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减弱……从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做好了调查研究……不致于陷于现在的被动。”他明确表示:“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6]861}

同一天,周恩来也在小组会上说:“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7]

3月23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在我个人来说,在书记处来说,日常工作做得不算很坏,但是在重大的决定方面出的好主意不算很多,主要就是缺乏调查,调查研究不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看报告……察觉了之后,应该有个办法,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一个根本的工作方法。”3月27日,邓小平在传达广州会议精神时说:“最近几年,工作好了,就舒服了,不搞调研了。中央也是按级听汇报,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到也不重视……县以上领导机关要把调查研究恢复起来,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

方法。”^{[8]1624,1625}

广州会议对调整农村政策、稳定农村形势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农村的情况摸得不够细,认识程度也不一致,会上对如何估计农村形势、如何看待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危害以及公共食堂问题,仍然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才能搞清。

二 中央常委农村调查见闻

1961年3月广州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陈林彪外全部下到农村搞调查。这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调查运动。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调查研究,彻底摸清农村情况,以利于调整农村政策。事实证明,这次调查研究对中央最高层迅速下定决心,果断作出相关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带动了全党工作作风的大转变。与以往领导人外出视察主要是听取各级干部汇报不同,这次调查面向的对象是忠厚朴实的农民。当他们看到农业生产破败萧条景象时,不能不对“大跃进”的严重错误和带来的苦果有切身感受,因而对农民强烈要求解散公共食堂的要求产生了共鸣。

(一)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

1961年4月1日,63岁的刘少奇来到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在调查中,刘少奇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通过开座谈会、实际走访等方式了解到了一些真实情况,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

关于食堂的优越性——“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刘少奇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现行政策对不对,尤其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公共食堂问题。

4月13日和14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连续召开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在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由于受“左”的影响,这些人没有讲实话。座谈会没有收获,刘少奇决定直接到群众中调查。第二天,刘少奇看了天华大队施家冲食堂,又邀请几个社员开座谈会。在刘少奇诚恳态度的感染下,大家纷纷诉说入食堂后生活上的不便和对生产的影响。在听取群众意见后说:“我看是这样,因为搞食堂,很多人在一起住,自留地没有了,猪不能养了,鸡鸭不能养了,许多东西比以前少了,社员的生活比前几年差了……于是,许多人‘坐大船’,不积极。这怪不得你们,首先是我们中央要负责,不晓得你们这种情况。为什么不晓得,还不是官僚主义。”4月17日,刘少奇在出席天华大队总支委会时说:“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

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9]

5月3日,刘少奇回到老家炭子冲继续调查农村情况。在这里,朴实的乡亲们向他讲了真实的情况。5月7日,刘少奇在同炭子冲农民谈话时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10]329}

连日来的调查,使刘少奇对公共食堂的“优越性”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把食堂问题看得很严重:“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人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6]865}

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关于国民经济产生困难的原因,很长一段时期的说法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毛泽东虽然讲到造成困难的原因除了天灾外,“人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并且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还没有意识到工作上“左”的错误才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然而,刘少奇在调查中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在调查中,刘少奇了解到,由于天华大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国家高征购,致使社员口粮严重不足,处于半饥饿状态,严重损害了社员生产积极性。而且,在兴办公共食堂时,将大队1/3的房子拆掉,60%的社员被迫搬家,再加上社办企业和大队副业无偿占用社员住房,使社员住房减少一半以上,不少人家三代同住一室,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还使得天华山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刘少奇视察天华山归来后痛心地说:“我到天华山一望,山都挖的稀烂的。年老的农民都懂得,再禁止,让他挖下去,将来是一大害!”^{[6]868}

许多汇报材料说,湖南去年遭受大旱,所以农村经济困难是因为天灾。但是刘少奇在同农民谈话时问: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农民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6]868}。刘少奇还找来小时候一块放过牛的农民朋友李桂生了解情况。刘少奇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没?”“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肯定地回答。“还

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的晒得谷,那样大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11]后来,刘少奇多次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造成农村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二)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的四个昼夜

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连续四个昼夜开展调查研究。武安县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当地群众曾为支援八路军抗日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周恩来在伯延公社社员家中看到的情况令他十分震惊,这里的乡亲仍旧十分贫困。

在调查食堂问题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对周恩来讲出了实情。他说:“食堂好,食堂吃不饱”,“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更严重的是,“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吃不饱。”周恩来问他为什么,张二廷说:“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12]后来周恩来说:张二廷的发言“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的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在调查中,周恩来还向社员们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会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周恩来认识到,中央关于开办公共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社员们对此反应也比较强烈。5月7日凌晨三点半,周恩来请秘书孙岳向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1)食堂问题,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4)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凌晨四点四十分,毛泽东批转了周恩来的报告。

(三)邓小平顺义县农村调查

4月7日至21日,邓小平轻装简从来到京郊顺义县农村开展调查研究。顺义地处华北平原,农业生产发达,被称为“北京的粮仓”。农业合作化后,粮食连年增产。然而1959年和1960年,粮食产量却接连下降,原因就在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的失误,致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高。

4月15日,邓小平在上犂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座谈会上反复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敢说不好,反而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吃食堂也不错。邓小平严肃地说,公共食堂是个大问题,现在群众议论很多,要注意一下。当听到上犂村吃食堂是假,由食堂分粮食,社员回家做饭是真时,邓小平高兴地表扬了上犂村,他说:“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4月18日,邓小平视察了白庙村里的公共食堂。到那儿一看,食堂已经停火,显得很荒凉。邓小平对干部们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去留。”^[13]此话一出,全县的公共食堂都纷纷解散了。

经过半个月的调查,邓小平对恢复农业生产形成了自己的看法。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在顺义和怀柔的调查情况(彭真率领的调查组主要在怀柔县搞调查研究)。信中说:“现在实行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可以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是不是可以采取对包产部分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鼓励社员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以便利。”^[8]₁₆₃₆₋₁₆₃₇5月13日,毛泽东批转了该报告。

(四)朱德南下调查

1961年初,北京会议结束后,朱德即离京南下,到各地开展调查研究。1月30日,朱德给毛泽东写信推荐浙江养蚕中“四包一奖”制的经验。接着,他又去了福建、江西、广东,视察工厂和人民公社。3月6日,朱德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视察情况: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对此,“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干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14]₇₀₃

3月24日,朱德参加完广州会议后北上,先后考察了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5月9日,朱德给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反映调查情况。其中,报告中反映最强烈的意见是群众对公共食堂不满:“四

川农村的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45%到50%。”^[14]₇₀₄₋₇₀₅

(五)陈云青浦农村调查

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陈云是较早认识到调整农村政策重要性的高层领导。1961年4月7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不一定都吃食堂,没有食堂难道社会主义就会垮台吗?粮食不到户,农民不敢讲话,否则他怕扣粮票。还有自留地一定要坚持,农民说得好:‘我磨豆腐,由你点石膏不行,要我们自己来点。’”^[15]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为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提供依据,陈云于1961年6、7月间对青浦县小蒸乡进行了调查。

小蒸地处江南水乡,原来树木葱茏,竹林茂密,现在却一片荒凉。在小蒸乡半个月的调查中,陈云听了两次汇报,开了十次座谈会,对养猪、自留地、干部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

上级的瞎指挥给小蒸带来了深重灾难,“其他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取消公用食堂,青浦农民还被迫在公共食堂吃饭,一个农民一日三餐,每餐一大碗稀粥,实在吃不饱。”^[16]陈云根据实际情况给当地提出了三点意见: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少种一些双季稻和小麦,多分一些自留地,目的是“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据随陈云考察的周太和回忆:“经过半个月调查,基本摸清了情况。农民对我们党既有表扬,也有批评。陈云同志特别注意倾听批评的意见。概括起来,农民有四点不满:一是对吃稀饭不满意。”“二是对干部不参加劳动不满意,说干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白工’,群众是‘头发白松松,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还说不劳动’。三是对农作物改制……有意见,说干部‘嘴唇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四是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不满。他们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还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陈云同志对农民的意见不仅耐心听,而且作了解释,有些还主动承担责任。”^[17]

三 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

经过几个月的“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常委们在公共食堂、供给制、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坚定了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调整的决心。

(一)对农村形势的正确评估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再次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农村工作。会议开得比较活泼,与会者都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通过回顾党的历史,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深刻总结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他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搞下去了。”^{[10]337-338}

周恩来在会上也做了深刻的发言。他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讲到这里,刘少奇在一旁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有些事情发生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查,摸得不细,心里没底。”^{[4]637-638}

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下乡蹲点搞调查,但是他亲自指导的三个调查组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调查材料,加之各地报送的一些材料,毛泽东对农村的形势也有了正确的认识。1961年4月16日,毛泽东在长沙蓉园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等开会。在谈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5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说的人家的话,听地委、县委的,总之都是听来的,说人家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话。”“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是反对的。”5月23日,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群众路线很

重要……我们党内有许多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食堂问题,没有调查,只是听人家的,不是听群众的。”^{[5]26,28}

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大有收获”。毛泽东说:“今年3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决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而这次会议“把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5]30}

(二)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

公共食堂诞生于1958年,其目的是服务于“大跃进”,架起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当时的人们认为,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可以解放大批劳动力。因此,公共食堂一度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高层领导人的青睐。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办不办公共食堂被上升到是否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1960年在中共中央针对农村危局下达紧急指示信中仍然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加大了对农村政策调整的力度,但是仍然坚持要把公共食堂办下去。

在经过1961年上半年的农村调查后,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公共食堂实际上成为束缚农村生产力的枷锁。邓小平和彭真给毛泽东的联名信中还提出了取消供给制的理由:“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对地富和上中农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少;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18]326-327}

根据常委们的调查结果和基层干部、社员们的愿望,5、6月间的北京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修正案,对公共食堂、供给制等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做出了根本性改变。将过去的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18]。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共产主义因素”。

在落实农业六十条的过程中,各地还初步调整

了社、队的规模,大幅度增加了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数量。而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则是 1962 年的事情了。

四 结语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 1961 年,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退却,而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依靠调查研究,到实践中寻找战胜困难的方法。“我们共产党人的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都要符合群众的利益,都要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并且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去实现。”^{[5]29}

更重要的是,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党提高了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管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你们、伙夫、马夫讲的,拿到群众中行得通才行。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5]29}“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3]1169}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理想主义中走出,回归到正常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450.
- [2] 陈如龙. 当代中国财政:上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85.

- [3]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4] 金冲及. 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四:1961 年的全党调查研究[J]. 党的文献,2013(3):17-34.
- [6] 金冲及. 刘少奇传: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7] 力平,马芷荪.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98-399.
- [8] 冷溶,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9] 刘崇文,陈绍畴.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12.
- [10]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1] 黄峥. 刘少奇一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369.
- [12] 熊华源,廖文心. 周恩来总理生涯[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47.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人生纪实:中册[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036,1039.
- [14] 金冲及. 朱德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5] 金冲及,陈群. 陈云传:下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257.
- [16] 薛暮桥. 薛暮桥回忆录[M]. 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68.
- [17] 金冲及,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66.
- [1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01.

In 1961 the Central Committee Rural Survey and the Adjustment of People's Commune

WANG Tao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ree years of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had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 Chinese economy,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Facing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MAO Zedong called on the party “energetically encourage the practice of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seek the truth from the people”, to fi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from the practice. Liu Shaoqi,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members of Central Standing Committee were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to carry out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During the close contact with the farmers, the Central Standing Committee mastered a lot of firsthand material.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justed the rural people's commune system, and canceled the public canteen and supply system which bound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roductivity.

Key words: In 1961; The central committee; MAO Zedong; The wind of daxing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he people's commune